

张军◎著

走近 经济学





走近 经济学

张军◎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近经济学/张军著.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01.3

ISBN 7-108-01533-1

I. 走… II. 张… III. 经济学-通俗读物
IV. F-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179 号

责任编辑 薛松奎

封面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新知电脑印制事务所

印 刷 北京市宏文印刷厂

版 次 2001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5

字 数 162 千字

印 数 00,001-10,000 册

定 价 13.80 元

作者简介

张军,生于1963年。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留学和工作于英国伦敦经济学院、苏塞克斯大学、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等国外著名学府。主要从事转轨经济学,特别是中国国有工业经济改革的研究。代表作有《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2》、《现代产权经济学》、《经济、社会与文化:张军经济随笔集》、《合作团队的经济学:一个文献综述》等。

代序：致读者的话

我赖以生存的经济学“学科”在国内还被叫做“文科”，但我不能算个文人。在我居住的公寓里，有很多文人。起码，看上去我与文人有许许多多的差别。走进文人的寓所，最能体现文人之人文精神的是他们的书房。今年初，上海的《新民周刊》上曾对沪上著名文人的书房有过图文并茂的专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我的印象里，文人的书房一般都比我的大许多，布局非常考究，尽量体现自己的做人风格和从事的职业背景。不仅拥有大量的藏书，而且书房里挂满了名人字画，也放上几款花草盆景，营造了一个人文味十足的空间与氛围，置身其境，让人回味无穷。

我不知道这些是否真能把一个经济学家与一个文人区别开来。我仅知道我有一堆书籍，但没有书房，只在封闭的阳台上自制了一张狭长的写字台，上面除了一台桌上电脑、打印机以外，还有一部笔记本电脑和一只手掌电脑。它勉强可以叫做“工作室”。我经常读书，但不在工作室，我花好多时间在大学的资料室采集和研究数据，阅读文献，也花不少时间在电脑上与我的国内外同行进行通信，关注世界上我感兴趣的最新研究成果。当然，我也频繁出国开会、讲学或从事合作研究，

在工作室的时间越来越少，因为我可以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从事研究工作和写出论文来。

以我之见，文人读书写字不仅自得其乐，主要还为大众所喜爱。当今，经济学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经济学人的文字越来越“脱离”民众，只为同行津津乐道。不过，这可能是所有科学发展的共通之处，自然也不能谴责、漫骂经济学家。经济学家有没有人文精神、有没有人文关怀，不应与经济学作为科学的发展规律拉扯起来。毕竟，在这个社会里，总会有人来传播经济学的知识的。也许，把科学变成知识是使科学家、理论家被大众所接受、所喜爱的惟一途径。

不是去写一本所谓的简明经济学或大众经济学，而是以某种方式把经济学的理论变成公众所领会和喜爱的一些知识，是我这些年来始终没有放弃的一种努力。我的主要精力还是用在经济理论的研究与教学方面，但平常仍是会抽出一些时间用自己的职业眼光来记录一些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对读到的书籍以及访问过的地方谈一些心得与感受，这个习惯大概自 1992 年起未曾改变过。日积月累，我在国内的新闻性刊物，包括周刊和报纸发表了不少心得、随想与见闻之类的习作。与我的经济研究论文相比，这些被称为“随笔”的文章写得比较随意悠闲，不苛求文章的精致结构和论证程序，但能包含或传递一些知识；不追求文学的渲染和构思之精巧，尽量做到文字流畅、简单，的确也时常希望能有一些文采，只是力未必真能从心。

两年前，出于冲动，我曾将自己发表的一部分经济随笔和短论文章 39 篇汇编成了一本集子，取名为《经济、社会与文化：张军经济随笔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承蒙读者的

厚爱，这本集子现在已经脱销。收录在那本集子中的文章截止到1998年的年初。而在此之后的两年时间，我又陆续发表了几十篇随笔，多为读书评论和研究心得，内容涉及经济思想史、经济学方法论、经济思想和观点以及对“热点”的冷静思考等等。于是，对近两年的文章做些筛选，再加上第一本集子的部分文章共有44篇，作为前一个集子的“修订版”重新结集出版，也许是一个不错的想法。在对文章的选编中，我发现近两年的习作文章多为读书研究之心得，用《走近经济学》来冠名显得就更为贴切些。但我现在已意识到，我终究不算是文人，连给自己的集子取的名字也难免缺乏人文的情趣。这或许是经济学人与文人的又一个差异吧。

正如我提到的那样，除了在《读书》、《经济学消息报》、《万科周刊》等发表些文章之外，近两年我也被邀请为一些著作写些书评文章和为时事热点撰写评论。去年秋天，北京的一家报纸《中华图书商报》的《书评周刊》发动“千年阅读”的大型创意活动，纪念第二个千年的来临。我应邀担任“经济学”的撰稿人，写下了长篇思想随笔，取名“在长期，我们都死了”。这是经济学家凯恩斯的一句名言，但对于我文章中所涉及的那些经济思想的承传大师来说，这句话也非常悲壮、非常浪漫。这篇文章篇幅较长，但最后我还是决定将它收了进来，作为本集的开篇之作。

另外，集子还收入了我今年以来为上海《新民周刊》所撰写的7篇时事评论。去年岁末，我和沪上3位学人与《新民周刊》签约，开辟“一周谈”专栏，我定期撰写经济时事评论。但即使是时事评论，我还是坚持我的“风格”，不就事论事，把评论写成思想随笔，倒也坚持得住，尚不知市井平民是否真有

耐性。

这本集子的出版移师北京，而不再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主要是北京“梁晶工作室”的梁晶女士说服我的结果。当然，在北京出版我的著作也是我的心愿，虽然我的主要研究论文都是在北京发表的，但我尚未在北京出版过自己的著作，惟一的例外是，我曾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梁晶工作室”出版过几部经济学的翻译作品。我很荣幸地得知，北京的三联书店愿意担当本文集的出版者，我当表示谢意。

张 军

2000年8月30日于沪上嘉华苑寓所

目 录

代序:致读者的话· 1

书架上的经济学· 1

股民的幽默· 19

社会科学与达尔文主义· 24

另一种“数字化生存”· 30

民办企业和企业家精神· 36

学问成本· 39

经济学家的未来观· 43

我们相信市场吗?· 47

什么是“贫富”?· 52

——从财富分配看收入分配

蟋蟀与洗衣粉· 58

——我们的世界为何五彩缤纷

商标·市场与商业道德· 62

道德与经济学:近年来的发展· 66

道德与西方经济学· 70

什么是腐败?· 74

文化变迁与经济发展:一个简短的评注·····	81
什么是社会的契约?·····	88
走近“经济研究”·····	93
——初读《应用经济学研究方法》	
管理时代的经济学·····	104
——《经济学、组织与管理》(中国版)序	
伦理的经济学,但是一个德国哲学的表述·····	110
——读科斯洛夫斯基的《伦理经济学原理》	
演进主义视角的比较经济学·····	115
——詹姆斯·安格里萨诺的《比较经济学》中文版序	
倒霉的塔洛克与幸运的寻租经济学·····	123
诺思再论制度变迁·····	129
“过渡”与“战略”·····	134
——《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读后札记	
“自我履约”理论的回声·····	140
——评关于中国农业合作化与农业危机(1959—1961)的 一场国际争论	
原苏联经济增长的误区在哪里?·····	146
“政治人”与“经济人”·····	150
——《公共选择》译后感述	
国家与市场:英国公关部门的改革·····	158
“礼券”在行动:私有化进程中的俄罗斯人·····	163
市场理念·····	166
关注“上海货”·····	170
富康、桑塔纳“不打不成交”·····	174
“彩电峰会”的象征意义·····	178

“网络”何以经济?	182
“西部”的价值	186
民间力量	189
“斯密定理”与中国企业的效率改进	193
“青岛啤酒”与我的“国企”理论	198
进化论或退化论	203
布鲁塞尔一日	206
泡沫的东京	210
相聚塞纳河	214

——新制度经济学国际协会第二届年会散记

伦敦遐想	219
天才一角	225
再访剑桥	228

书架上的经济学

本世纪就要在我们面前走完它的最后时刻，人类将从此跨入又一个千年。世纪回眸，千年阅读和阅读千年，与其说是对我还不如说是对经济学的挑战。80年代初，研修中国古代经济及经济思想史的书，我确实知道经济和经济思想那源远流长的历史，但我并不真正知道今天我所理解的经济学到底有多古老。后来在西方，人们常说经济是古老的，但经济学却是年轻的科学。这显然是因为他们并不把比如思想大师亚里士多德视为经济学家的缘故。这自然是有道理的。我也在此如法炮制，以我书架上所摆出的“经济学”作为自己视野里的经济学的历史跨度。我相信，这是我最熟悉的经济学，也是我最熟悉的“历史”。除了我手头的两本（西方）经济思想史之外，我没有更多的文献来超越斯密的《国富论》（1776）的年代，我是说，这是我读过的最“古老”的经济学著作。因此，为了给这篇文章找到发表的充分理由，我只能再补充一句希望能够破题的话：经济学虽然无法因过去的千年而显示其辉煌，但却因其辉煌而渲染着一个千年的结束。

古典体系

众所周知,至少在 19 世纪末之前,西欧无疑是近代经济学成型和迅速成长的摇篮。从英国的配第到法国的魁奈,从斯密到萨伊,从李嘉图到瓦尔拉,从屠能到西尼尔,从格森到古诺,等等等等。而在 1750—1870 年这段时期,也就是从重农主义到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的产生这段时间,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实际上又成了近代的“经典”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熊彼特好像说过,在这一段时期,英国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斯密—李嘉图—穆勒的古典体系”。当然,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属于这个“古典体系”的除了斯密、李嘉图、穆勒之外,还应该包括像马尔萨斯、马克思等这样伟大的经济学家。作为古典的经济学,后人对于什么是古典经济学的中心论题以及什么又是古典的体系这样的问题在经济思想史上一直是存有争论的。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如何评价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在“古典体系”当中的相对地位?李嘉图的经济学是否继承了斯密的“体系”?

首先,我们必须重视“政治经济学”一词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的重要意义。在古典的意义上,“政治经济学”涵盖了今天我们称之为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全部内容。我所看到的许多文献在涉及古典的政治经济学的含义时都提到斯密在《国富论》第 4 卷的导言中所写的一段话:“作为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务的科学分支,政治经济学有两个明确的目标:首先,它要为人们提供,或者更恰当地说,使人们能够为自己提供丰厚的收入或生活资料;其次,向国家或全体国民提供足以维持公

用事业的财源。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国富民强。”这段话后来也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领袖人物莱昂·罗宾斯(L. Robbins)教授在《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经济学》(1976)一书中所倡导的研究传统的基础(罗宾斯,《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经济学》,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

那么,古典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到底是什么呢?在斯密 52 岁完成的这部 5 卷本巨著《国富论》中,经济学论述的问题的确是包罗万象的,但斯密提出并论证的“自然的自由制度”(特别是自由贸易学说)的经济理论则在 120 年后的马歇尔那里转换成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实质性架构。可是,现在几乎所有的古典经济学说史家都认为,李嘉图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的出版使斯密的经济学体系发生了从概念、范式到重点的变化。例如,有的当代学者认为,斯密学派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在 1817 年以后的确要由“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来限定了,甚至还有“李嘉图革命”之说。不过,正如熊彼特的观点那样,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发展阶段来说,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可能的确是从斯密到穆勒体系这条发展主线的一个小小的弯路。这一点在丹尼斯·奥布莱恩(D. O'Brien)在 1975 年出版的著作《古典经济学家》和 1981 年发表的论文“李嘉图式的经济学和李嘉图的经济学”中得到了发挥。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古典经济学”条目下,著名的经济思想史学家布劳格(M. Blaug)认真地比较了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和斯密体系的区别。他认为,好在李嘉图的“弯路”很快就被纠正了,因为在 1823 年李嘉图死后的 10 年内就基本上被他的“信徒们”抛弃了。因此,包括布劳格在内的不少人还是认为,古典经济学的整体体系仍然是一致的。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论述的问题比斯密的《国富论》要少得多。不仅如此,李嘉图还没有继承斯密的关于价值(价格)决定的理论体系,而将注意力转到了“分配问题”。没有正确地把生产(价格)和分配问题统一起来的所谓“李嘉图谬误”后来也成为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1954)中和芝加哥大学的富兰克·奈特(F.Knight)在《李嘉图的生产和分配理论》(1956)中对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进行批评的根本原因。可是,李嘉图的这个“弯路”在英国古典经济学说史上插入了一个所谓的“作为剩余理论的古典经济学”的话题。当然,也可以这么说,没有李嘉图的这个“弯路”,就没有后来的马克思的经济学。如果我们把“剩余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视为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的主线的话,那么,正如布劳格所说的那样,把马克思列为最后一批“剩余”的古典经济学家也是恰当的(布劳格,“古典经济学”,载《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第480页)。

作为剩余理论的继承人,马克思无疑从李嘉图那里学到了后者的分析范式。然而,马克思创造性地发展了“剩余价值理论”,这是他对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的超越。为《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撰写“马克思”条目的欧内斯特·曼德尔称,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他对(古典)经济学最具革命性的贡献,他发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长期运动规律毫无疑问成了他最杰出的成就,19世纪没有第二位作者能像马克思那样始终清醒地预见到资本主义怎样运行、发展和改变世界。的确,马克思首先是一位预言家和社会学家,他的经济学始终在充实他的社会学框架。在这个意义上,我更欣赏熊彼特在著名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1942)中对“作

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所做的这样的高度评价：

作为经济学家,马克思首先是一个博学的人。马克思作为一个作家,我一直称他为天才和预言家,而我认为有必要突出上面这一点,这似乎有点奇怪。然而,意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天才和预言家通常不是在某一专门的方面很杰出,正是因为他们不是某方面的专家,因而具有独创性。但是马克思的经济学中没有什么能说明他缺少作为学者的素质,或缺少理论分析技术方面的训练。他是一位贪婪的读者、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很少遗漏重要文献。他消化他读过的所有东西,深入思考每一个事实,怀着热情争论不寻常的问题的细节,他习惯于透视包含整个人类的文明和延续发展的历史。或批评,或反对,或采纳,或综合,他对每一个问题总是要探索透彻。最突出的证明就是他的剩余价值理论,这是理论方面的里程碑。(转引自熊彼特,《从马克思到凯恩斯》,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

不过,提起“作为剩余理论的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式的经济学,我们也不得不提及本世纪年轻的剑桥大学的斯拉法(P.Sraffa)所做的卓越贡献。在剑桥,他是和数学家兼经济学家的年轻的拉姆齐(F.Ramsey)和冯·诺伊曼(J.von Neumann)一样仅靠3篇论著而成为名声大噪的伟大经济学家的天才。特别是,他于1960年出版的仅99页的小册子《用商品生产商品》可谓开创了一个把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结合为一体的“古典结构”。这种结构复兴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剩余

产品”的分析范式，以至于人们今天干脆把古典经济学称为“斯拉法体系”。

剑桥遗风

“斯拉法体系”也许可以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但斯拉法的出现则勾起我对美丽剑桥（英国）的回忆。150年来，这里曾活跃着马歇尔、庇古、凯恩斯、斯拉法、拉姆奇、米德、罗宾逊夫人、哈罗德等一代代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使剑桥堪称现代经济学的摇篮。我每次走在剑桥的古老学院的台阶上，心灵都无不为之震撼。

1929年5月，经济学家庇古（A. Pigou）在一次演讲中说到，我们最近先后失去了剑桥的马歇尔（A. Marshall）和牛津的埃奇沃斯（F. Edgeworth），他们俩毫无疑问是近30年来英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的确，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有关马歇尔和埃奇沃斯的条目都多达20页以上。马歇尔作为所谓“剑桥学派”的创始人，他的《经济学原理》（1890）和《工业与贸易》（1919）完成了经济学从古典的“斯密—李嘉图—穆勒”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换，成为现代西方正统经济学的基础之作。在马歇尔之前，欧洲的经济学，特别是法国的瓦尔拉（M. Walras）、古诺（A. Cournot）、德国的屠能（J. Thunen）和英国的杰文思（W. Jevons）等经济学家在转换穆勒的结构和研究范式方面肯定对花去马歇尔20年心血的集大成之作《经济学原理》影响不浅，但马歇尔仍然代表一个时代的开端。马歇尔的“原理”建立了一个较为成熟的经济学的“静态学”分析范式（这就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局部均衡分